

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文献综述

董平

四川大学 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为防范银行挤兑风险和保护投资者利益，我国从六年前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但是究竟这一制度能否有效控制银行风险，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目前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是否有效降低银行风险、受宏观因素的作用、受微观因素的作用和其他。通过文献回顾可以推断未来的研究趋势：在时间空间两个维度上更加细化，一是会在银行异质性研究上更加深入，另是考察制度实施的短中长期的影响。此外，结合行为金融进行研究会是另一个研究趋势。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银行风险；文献综述

一、引言

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控制银行的挤兑风险和减少投资者损失，我国从六年前开始实施这一制度，与其他国家相比起步较晚，经验稍显不足。跟美国等国家的存款保险制度安排不同，我国的这一保险并非自愿的。究竟这些制度安排和措施设计带来的“稳定效应”更大还是诱发的道德风险更大？不同银行对该政策的风险调整是否相同？制度设计的细节能否精准地规避不同银行的道德风险？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和探究是极具有现实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对中国的存款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参考，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控制整个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针对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主要是基于四个方面开展的：

存款保险制度是否降低银行风险（稳定效应和道德风险）、两者关系受到宏观因素的影响、两者关系会受到微观因素的作用（银行异质性）、其他。

（一）存款保险制度是否降低银行风险

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旨在控制银行的破产风险和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所以学界研究得最多的就是存款保险制度是否能有效地降低银行的风险。就这一主题的研究文献来看，学术界至今仍然众说纷纭，未能得到一致的结论。实际上，稳定效应和道德风险并不是分离的，而存款保险的总体作用如何？取决于稳定效应和道德风险

的竞力。

1. 稳定效应

有的学者认为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行是有效的，能对银行产生稳定效应（Merton, 1977）。后续的一些学者通过跨国横向对比和政策前后纵向对比验证了这一点。Cull et al. (2005) 通过跨国数据对比，发现该制度在那些法律完善和监管严格的国家更能体现出稳定效应。

赵胜民和陈蓓（2019）基于一百多个国家数据的实证结果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在控制银行的违约风险方面有显著有效性，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Gropp & Vesala (2004) 和 Chernykh & Cole (2011) 则是研究单一国家（或地区）的银行风险在存款保险制度实施前后的变化证明了这点。

2. 道德风险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存款保险制度是会导致银行的道德风险进而过度承担风险（Dowd, 1993）。Hovakimian et al. (2003) 通过跨国数据的对比，发现这一制度破坏了银行原有的收益损失关系，进而滋生出道德风险。王晓博（2015）也指出，它不仅导致个体道德风险，而且还会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郭晔和赵静（2017）对我国非国有商业银行的数据研究中也发现存款保险制度的这一负面影响。产生道德风险的原因主要在于银行的风险可以被转移出去后更有冒险动机（Hovakimian et al., 2003），并且存款保险制度会弱化存款人对银行的监督激励，导致银行更有机会进行高风险经营（Demirgüç-Kunt & Huizinga, 2004）。有了冒险的动机和条件后，结果就是银行疏于管理，无论在内部治理还是风控方面都会弱化，使风险更加恶化（Laeven & Levine, 2009）

作者简介：董平（1997—），女，汉，籍贯：四川省会理县，硕士在读，研究方向：风险管理与保险，单位：四川大学，单位所在省市：四川成都，单位邮编：610065。

（二）宏观因素的影响

宏观层面的因素主要包括：宏观经济状况、市场发展程度、监管和法律制度等。Anginer et al. (2014) 的研究表明经济基本面会很影响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在经济繁荣时道德风险更强，而在危机动荡的时期稳定效应更强。王晓博等 (2018) 的实证结果表明危机前中后三个阶段的银行风险调整机制不同。赵胜民和陈蓓 (2019) 发现新兴市场国家的稳定效应更明显。另外，学者们的文献一般都认为监管制度完善和监管更严格的国家，其道德风险能明显受到抑制 (Cull et al., 2005; 王道平 (2016))。Keeley (1990) 把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的银行道德风险频发归结为金融自由化和宽松的监管。与之对应的，Calomiris (1990) 发现纽约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实施就在于较高的监督能力。田国强等 (2016) 实证发现宏观环境和金融市场环境会对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效果产生显著影响。

（三）微观因素的影响

微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是指银行的异质性，对相关文献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这些因素具体包括：银行的规模、产权性质、自身风险、治理结构、特许权价值、资本充足率（也可用杠杆率）等。

1. 银行规模

关于银行规模的影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大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更严重。因为大银行 too big to fail，其管理者会认定政府不会任其倒闭而具有较高风险倾向 (Ennish & Malek, 2005)。且大银行更具有资金和风险管理技术的优势，故风险倾向更严重 (Alessandri & Haldane, 2009)。第二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大银行受到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因而更难实现高风险经营 (Houston et al., 2010; 张建华和王鹏, 2012)。并且，大银行凭借其优势地位盈利压力比商业银行小得多，所以其进行高风险经营的动机更小 (López et al., 2011)。

2. 产权性质

国有大型银行和其他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不同。一方面，中国对国有大型银行长期存在隐形保险制度，所以就将是这种制度显性化了，对国有银行来说并不产生实质的变化，而对其他商业银行来说确实很大的一个冲击 (汪莉等, 2016)。另一方面，国有资本的绝对控股，高管的薪酬严格执行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因此国有银行的高管并没有为获得高薪酬收益而冒风险的动力 (项后军和张清俊, 2020)。王艳艳和于李胜 (2013) 则从社会职能这一视角分析，认为国有银行除了以盈利

为目标外还需承担很多社会责任和接受更多监督。

3. 自身风险

中国目前采用的是风险差别费率制，但是这样的费率制度是否能降低中国银行的风险呢？根据项后军和张清俊 (2020) 的实证结论，这一制度的实施效果存在两极分化现象，即在降低高风险银行的风险的同时会提高低风险银行的风险。基本的逻辑是：银行的实际风险状况很难准确地量化，银行实际缴纳的费率和真实风险对应的费率不一定相等，如果实收费率高于真实风险对应的费率（低风险银行），银行相当于多缴保费，这将进一步压缩盈利空间，为了维持盈利性会进行高风险经营；反之，便不容易产生冒险倾向。

4. 治理结构

考虑到大股东对公司经营决策的影响，银行的治理结构也是影响存款保险制度有效实施的一大微观因素。因为相较于股权分散和权力制衡较好的银行而言，股权集中的银行更容易实现高风险投资 (Amihud & Lev, 1981)，因而也更具有进行道德风险所需的现实客观条件。因此，可以看出，分散的股权结构以及完善的内部治理体系能更好地抑制道德风险的问题。江俊蓉和宫鹏浩 (2015) 和郭晔 (2017) 的实证结论都说明了这一点，股权结构集中的银行的在存款保险制度下风险偏好更强。

5. 资本充足率

商业银行的行业属性导致其必然具有高杠杆的特性，而资本充足率则是它在偿还负债端投资者的债务时，能以自有资本承担的程度。通常，银行投资中自有资金占比越多，银行投资越谨慎，越不具有冒险倾向 (张雪兰和何德旭, 2012)。Konishi 和 Yasuda (2004) 和张健华和王鹏 (2012) 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观点。Bichsel & Blum (2004) 对瑞士银行的研究发现，其风险承担的水平会随着银行杠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胡援成等 (2020) 和项后军 (2020) 也发现，资本充足率低的银行面对存款保险制度时，其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显著高于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

（四）其他

关于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风险承担的其他方面的文献，则包括研究存款保险的最优限额 (Angkinand & Whihlborg, 2010; 王晓博等, 2018) 以及存款保险不同条款的设计是否会影响银行市场约束 (Demirgüç-Kunt & Huizinga, 2004) 等。

三、未来研究趋势

根据前文的综述可以看出，对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

风险关系的研究经历了由检验政策是否有效，到研究作用机理，再到探究是否受其他因素影响的这样一个过程。研究的逻辑也从宏观整体逐步过渡到微观个体，从笼统到细致，从静态到动态。以笔者的浅见，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这一论题研究的发展趋势可能有两个方向：

(1) 在研究银行异质性影响的论题上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2) 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短、中、长期的变化（由于只施行了5年，只看得到短期的关系）；

(3) 从行为金融的角度研究存款保险制度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希望本文可以给后续学者的进一步深耕提供一些可能的思路。

参考文献：

[1]项后军，张清俊.存款保险制度是否降低了银行风险：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20,43(03):117-141.

[2]胡援成，王星宇，杨诗雨.银行特质类别、存款保险制度与风险承担效应——来自中国商业银行的经验

证据[J].金融与经济,2020(11):53-62.

[3]项后军，郜栋玺.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市场约束的研究[J].南方经济,2019(08):1-20.

[4]王晓博，刘伟，辛飞飞.政府担保预期、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J].管理评论,2018,30(10):14-25.

[5]赵胜民，陈蓓.存款保险制度能够降低银行风险吗？——基于116个国家面板数据的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9(07):56-65.

[6]韩喜昆，马德功.存款保险制度能否防范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基于Panel-Logit模型的实证检验[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9(03):37-46.

[7]张申.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中小银行道德风险研究[D].山东大学,2018.

[8]郭晔，赵静.存款保险制度、银行异质性与银行个体风险[J].经济研究,2017,52(12):134-148.

[9]刘鸿伟.基于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存款保险费率定价机制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7(01):68-77.